

過年貼門神是中華民族的古老民俗。有人考證，最早的門神，不是人，卻是虎，其依據就是《周禮》中的一個記載：「居虎門之左，司王朝。」這個說法是否靠譜，我不敢妄斷。不過，有確鑿史料認定的，最早以人的形貌司職門神的，是炎黃時期的神荼和郁壘。相傳這兩位大將能發現惡鬼並將其降伏，所以炎黃子孫們便將他倆尊為最早的門神，守護家門。

到了唐代，神荼郁壘「下崗」了，門神被換成了唐朝的開國大將秦瓊和尉遲恭。這次換崗源於一個傳說，據說唐太宗一度常做噩夢，聞鬼叫而心驚。秦瓊和尉遲恭聞之，每晚全副披掛，在門外徹夜守衛。不過數日，太宗噩夢全消，遂大讚二位將軍「真是門神」。可又覺得他倆白天當值，晚上守夜，太過辛苦，便命畫師畫了秦瓊和尉遲恭的肖像，貼於門上，替代他們守夜。由此，這一皇家欽定的做法廣布於民間，遂使他倆成為佔位時間最長、名聲最響、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對門神。

門神的畫像被尊奉為全民的神祇，應歸功於春節期間家家必不可少的一年畫。不論是皇家宮殿還是貧民草舍，過年時總要貼上一對門神，不只為了營造喜慶氛圍，更是為了鎮宅驅鬼，就如同《白毛女》裏的貧家女喜兒唱的那幾句唱詞：「門神門神騎紅馬，貼在門上守住家，門神門神扛大刀，大鬼小鬼進不來。」「騎紅馬」的門神，我從來沒有見過。不過，我倒很想在農曆丙午馬年（二〇二六年）到來之際，能見識一下「騎紅馬」的門神，那才叫歲時應景呢。

門神的形象，本應是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文化記憶。然而，在我的成長歷程中，卻留下了一段記憶的空白。我是在城市長大的，在記事的年齡段，又趕上大破「四舊」的非常

時期，自然沒機會見識門神的「尊容」。我最早見到門神，是在天津楊柳青年畫社的外銷部裏，各式門神，大小不一，色彩各異，琳琅滿目。那已經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我已進報館當了記者。因為媒體採訪的關係，我與當時的畫社社長李志強先生成了朋友，才得以經常去觀賞精美的楊柳青年畫，娃娃畫、戲出畫、仕女畫、道釋畫，等等。志強兄還送給我一本當時印的介紹楊柳青年畫的圖錄，第一頁是名人題字，第二第三兩頁，就是一對大門神：尉遲恭和秦瓊，一個面黑虬髯，面目猙獰；一個面白長髯，眉目清秀。這對門神我在展銷廳見到過，標價不菲，可見是非常珍貴的。志強兄介紹說，這對大門神是清代時的老闆印的，據說，當年是進貢給慈禧太后在清宮大門上貼的。好多年都沒再印，這次重印出來，作為楊柳青年畫的代表作，就給排在圖錄的最前頭了。

大概是一九八六年吧，我去陝西鳳翔採訪震驚考古界的秦公一號大墓的發掘實況。在這片古老的鄉土，我第一次見識了家家戶戶貼門神的景象——彼時的季節雖已過了新春喜慶的高潮時段，但是各家門神的殘跡依舊隨處可見。這裏的門神，刻畫簡單，單色平塗，形象質樸，表情誇張，是典型的鳳翔年畫的風格，與楊柳青的門神差別明顯。可巧，我在鳳翔駐留期間，正趕上當地文化部門舉辦一次民間藝



▲二〇〇八年前後製作的楊柳青年畫門神。 作者供圖

術的調研活動，而在我所住的賓館裏，又無意中與主其事者有緣相識。如此一來，我竟被邀請作為外地媒體的記者，全程參與了這次對鳳翔民間藝術的考察之旅。在有名的鳳翔年畫主產地南肖里村，我觀賞了當地畫師的製作流程，也見到了當地世代傳承的年畫家族的傳人，還與他們交流了天津楊柳青年畫的不同製作方法。那位老畫師發現我還算個內行，非常興奮，特意拿出一塊老畫板給我看，那是一個蒼鷹的刻版，年深日久，已經殘損斑駁了。我悄聲問畫師：「你家有沒有門神畫？」他說當然有啦，可是現在沒存貨了：「門

神是過年貼的，我們都是過年前才印，早就讓鄉黨買光了，明年的還沒開印呢。」可能是我露出了一絲愜意吧，老畫師也有所察覺，似乎略有歉意，臨行前，就找出一張用那老版印製的蒼鷹圖，執意要讓我帶走，並且熱情相邀：「您到明年過年時候再來，我把門神給你留着……」我被鳳翔人的熱情深深感動，同時也對鳳翔年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回到天津，發奮研讀鳳翔年畫的文獻資料，並與楊柳青年畫作了比較，用功經年，寫出了一篇萬字長文《楊柳青與西北風——楊柳青年畫與鳳翔年畫的比較研究》。這篇文章在首屆中國木版年畫研討會上（一九九一年）首次宣讀。我並不奢望鳳翔的那位老畫師會看到我的論文，但是，我的這份「滴水之恩湧泉相報」的心意，已得到了一次酣暢的宣洩。

一九九三年一月，我南下深圳。剛到嶺南的那段日子，時常接待來自天津的各方友人，其中就包括楊柳青畫社的一班老友，來得比較勤的是王洪增、于錦聲、于晉鯉……他們有時是來辦展，有時是來「走穴」。有一次，他們北歸之前來我家小聚，帶來一個大畫盒。洪增兄悄聲對我說：「這件東西，本來是人家訂的。誰知帶來以後，人家看中了別的，這件不要了。我覺着挺沉的，再背回去也犯不着，就送給你吧，你懂行，留給你肯定有用——」他小心翼翼地打開木製的畫盒，我一看，不禁喜出望外：那是一對大門神，就跟我當年在畫冊上看到的一模一樣。我無法抑制自己的興奮之情，杯酒下肚，對他們幾位動情地言道：「你們不會想到我是多麼喜歡這對門神！你們想想，我們是舉家南下，來到嶺南，無親無故，連話都聽不懂，想念家鄉，想念親人和朋友，無法排解呀！有了這對門神，就好像請來了兩位天津老鄉，每到年節就來陪陪我們，解解鄉愁啊……」我無法拒絕這份來自故鄉的厚贈——從此，這對門神成為我在深圳家中，每至春節必須張掛的「圖騰」，這一掛就是二十多年。

唯一遺憾的是，這對門神只能掛在我們為它專門留出的一面白牆上，卻無法依照他們本來的身份，掛到我家的門上。門神門神，不能上門，總不能算是「諸神歸位」吧？然而，現代都市的住房，均已變成一個個「水泥格子間」，以往那種對開的大門已經悄無聲息地退出了當今都市人的生活；而大規模的新農村建設，勢必會讓古老的鄉土中國，迅速轉向城市化，農家小院的大門會不會也被單元門所取代呢？門之不存，神將焉附？每思至此，心底不禁又泛起一縷淡淡的愜意……

ChatGPT如何改變了我的認知與判斷



如是我見
席春迎

二〇二五年，是我人生的一個分水嶺。並非因為外部環境的驟變，也不是因為某一次戲劇性的成功或挫折，而是因為——這一年，我開始真正與ChatGPT共思考。

過去這一年，我逐漸意識到一件事：ChatGPT並不是一個「工具」，也不是效率層面的改良品，而是一個介入我思考過程本身的結構性變量。

它不替我做決定，卻悄然改變了我做決定的方式；它不替我創造價值，卻顯著提高了我創造價值的確定性。

這種改變並非來自某一次「驚艷體驗」，而是在反覆使用、反覆校正、反覆對抗中，慢慢完成的。直到某一刻我突然意識到：我已經不再以過去的方式思考問題了。

不是工具升級，而是認知方式的轉向

起初，我對ChatGPT的使用，與大多數人並無不同。查資料、改文字、做摘要、提建議——它更像一個效率型助手。

但很快我意識到，這種用法，嚴重低估了它的真正價值。真正的轉折，並不在於它「能給出多少答案」，而在於我開始把問題本身交給它：

不是「該怎麼做」，而是「為什麼要這樣做」；不是「沒有方案」，而是「這個問題的底層結構是什麼」。

當我開始向它拋出判斷型問題——從制度、資本、組織三個層面拆解一件事；區分顯性問題與被忽略的結構性約束；

檢驗一個判斷在不同假設下是否仍然成立——ChatGPT的角色，悄然發生了變化。

它不再只是回應我，而是在不斷逼迫我澄清自己。模糊的直覺，被迫轉化為清晰的語言；

未經檢驗的判斷，被一層層拆

解、追問、重組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它更像一個持續運轉的外置理性系統。

AI沒有削弱判斷，而是讓判斷第一次變得可檢驗

很多人擔心：AI會不會削弱人的獨立思考能力？恰恰相反。

對我而言，ChatGPT並沒有替代判斷，而是顯著提高了判斷的質量。

它把思考的重心，從信息搜集，推向判斷與取捨；把經驗驅動的直覺決策，推向結構化、可復盤的決策過程。

在涉及戰略選擇、資本結構、組織設計等複雜問題時，我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：

AI無法給你結論，但它可以顯著降低錯誤決策的概率。

因為它會不斷追問你：你的前提是否成立？你的假設是否自治？是否存在你尚未意識到的關鍵變量？

這種持續的「邏輯摩擦」，本身就是一種極高質量的思維訓練。

不是替你思考，而是讓你無法敷衍自己。

在創造層面：AI是放大器，而不是靈感源頭

在寫作、方案設計、結構搭建等創造性工作中，我對AI的定位也逐漸清晰：

它不是靈感的來源，而是靈感的放大器。

真正有價值的內容，仍然來自長期積累的經驗、判斷與取捨；來自你對世界的理解深度，而不是模型的生成速度。

但一旦方向明確，AI可以迅速完成：

結構的展開、邏輯的校驗、表達的優化、路徑的多重推演。創造因此發生了本質變化：

從「耗體力的輸出」，轉向「高密度思考後的快速成型」。結果並不是寫得更多，而是想得更深、做得更穩。

人和AI的邊界，在這一年裏逐漸清晰

這一年反覆使用下來，我對人與AI的分工，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判斷：

方向，必須由人決定；判斷，必須由人承擔；責任，永遠只能由人背負。

而AI更適合承擔的，是另一類任務：

拆解複雜系統，模擬多種路徑，放大已有認知，暴露潛在錯誤。

當一個人缺乏判斷時，AI只會放大混亂；當一個人具備判斷時，AI才會成為真正的槓桿。

AI的價值，從來不在於「替代」，而在於放大「你已經是誰」。

這一年的真正收穫：不是效率，而是認知升級

回過頭看，這一年與ChatGPT的共處，帶來的最大變化，並不是節省了多少時間，而是——

思考開始變得更有結構；表達開始變得更為精確；決策開始具備復盤與校正的能力；

創造開始呈現出系統性與連續性。

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：未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，不在於誰更聰明，而在於誰能更好地與AI協作，同時不丟失對自己的掌控。

在AI時代，更清醒地成為自己

而在那誰能更好地與AI協作，同時不丟失對自己的掌控。

如果說過去的工具，是延伸人的雙手；那麼這一代AI，已經開始參與人的認知過程本身。

這一年，我並沒有被AI取代。

相反，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識到：

什麼必須交給機器，什麼必須牢牢握在人自己手中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ChatGPT真正參與的，

不是我的寫作，不是我的方案，而是我在AI時代，如何更清醒地成為自己。



自由談
馬浩亮

八幕話劇《筆長城——一張報紙的抗戰》，是獻給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一份厚禮。首次以話劇的形式，全景式展現了「新聞抗戰」這一特殊歷史、特殊領域，充實了民族抗戰記憶的精神寶庫、藝術寶庫。

用話劇的形式呈現《筆長城》，可以說是最恰如其分的。筆，是《大公報》抗戰期間的主要「武器」，筆錄歷史，文章報國，「一枝禿筆」如利劍，橫掃千軍萬馬。長城，曾是《大公報》的重要「戰場」，范長江、孟秋江、邱溪映、方大曾的戰地報道，趙望雲、沈逸千的「塞北寫生」，都跋涉長城內外，熱情謳歌抗戰軍民的忠勇、抨擊日寇的暴行。而話劇，也曾是《大公報》發起文藝抗戰、鼓舞大眾的「舞台」之一，組織「大公劇團」，義演募捐，支援抗戰，鼓舞士氣民心。

因此，對於《大公報》而言，話劇《筆長城》，既是抽象的，又是具象的。可謂，用筆寫「筆」，以劇演「劇」，歷史與現實呼應，戲裏與戲外映照。

《大公報》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。在十四年抗戰期間，從一九三一年獨家報道「九一八」事變，到一九四五年那令人笑淚交織的「日本投降矣」，《大公報》與抗戰相始終，留下了最完整的新聞紀錄。十四年間，《大公報》誓不在日寇鐵蹄底下出版，為此六遷館址，播遷數萬公里。要將如此海量的信息，濃縮到話劇舞台上，殊為不易，極其考驗創作者的駕馭能力。

《筆長城——一張報紙的抗戰》在總體架構上，以新記《大公報》的「三駕馬車」吳鼎昌、胡政之、張季鸞為牽引，尤其是突出聚焦胡政之、張季鸞，以他們為「雙核」，以報館編輯部為樞紐，有機聯結范長江、王芸生、蕭乾、呂德潤、彭子岡等《大公報》的記者、編輯，進而通過他們的足跡，很自然地聯通了從延安作家群到山西抗戰前線，從香港揭露「汪日密約」到重慶談判，從天津一萬期報慶到印緬戰場，等等跨度極大的場景，世界風



▲當年重慶《大公報》編輯部。

筆中筆，劇中劇

雲，千頭萬緒，收束一「紙」。

並且，通過報紙這一獨特紐帶，上至政、商、文「頂流」，下至報童、士兵、小販等「底層」，不同群體的家國情懷，熔於一爐。可謂，繁而不雜，紛而不亂。

《筆長城》細膩刻畫了愛國報人的形象，這在以往的中國話劇史上都是很鮮見的。譬如，吳胡張「三巨頭」在報館運籌帷幄部署報道「九一八」，胡政之對日本「筆部隊」義正詞嚴的鏗鏘回擊，張季鸞站在重慶稻田的深情回憶、告白、囑託等，都非常具有典型意義和高度的概括性，因而極具表現張力，很好地提煉了個中的文化氣質，萃取了報人抗戰的獨特價值。通過這些「封面」級的場景再現，讓《大公報》堅持十四年為抗戰鼓呼吶喊的「新聞長征」，帶來剛柔相濟的藝術感染力。

在藝術形式上，《筆長城》也有很多新穎生動的創新手法。譬如，每一幕的啟幕，伴隨《大公報》的發展足跡和播遷路線，用天津數來寶《津門開》、京韻大鼓《盧溝月》、上海說唱《淞滬祭》、湖北大鼓《長江血》、四川藝人茶館說書擺龍門陣《重慶霧》、香港民間藝人在維港演唱地水南音《孤島殤》、桂林漁鼓《灘江恨》等等，迅速將觀眾代入新場景。而且，其作用遠不止此。抗戰中，《大公報》每到一地，便迅速扎根，贏得人心，就在於絕不把自己當成一個浮光掠影的「過客」，而是根植於不同的水土，扎實生長。還有周小燕原唱版的《松花江上》《歌八百壯士》《長城謠》，聲聲入耳入心，種種極富地域文化特色、打上時代風雲烙印的音樂和曲藝，既實現了自然的轉場、開場，起承轉合，別具一格，而又與劇情完美契合，烘托了《大公報》的人民性，時時與抗戰脈搏同頻共振。

話劇還多次採用《大公報》老報紙的標題、社評、版面，巧妙地作為解說、提示、背景，成為一種特殊的舞台元素。歷史與現實時時勾連，移形換影，一種強烈的縱深的時空感，撲面而來，將觀眾拉回到八十年前、九十年前。這也是報人抗戰這一題材的又一特殊「道具」。

憶往昔，崢嶸歲月稠；看今朝，道義落鐵肩。胡政之、張季鸞老一輩的報業先驅，在抗戰硝煙中創造了新聞史上的傳奇，築起了一座精神豐碑。通過《筆長城——一張報紙的抗戰》，他們將第一次如此齊整地作為主角，登上當代話劇舞台。他們的愛國熱忱，也將通過話劇的藝術表達，得到銘記、傳承與弘揚。正如劇中所言，「一支帶有溫度燃燒血性且永遠不熄的新聞火炬」，從此佇立於藝術之林，散發更多的熱量和光芒。